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三民主義意識型態的消失？

西方學界對於意識型態或結束或衰微的討論，多數認爲與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與之後共產主義國家的崩解有關。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階級衝突，也因爲福利國家制度的實施而和緩。意識型態終結的討論開始於五〇年代，到了一九六〇年代，貝爾（Daniel Bell）提出了一個令人爭議的論點說，意識型態的重大爭議，雖已持續了百年之久，甚至已逾百年，但已將要結束。殘暴的共產主義失敗，而福利國家興起，形成貝爾所謂的「意識型態完結」（end of ideology）。貝爾論證意識型態的爭鬥將因福利國家的來臨而逐漸消逝，此後政治爭論將會集中於，詮釋如何治理福利國家的技術問題。（張明貴，1998：159）貝爾認爲十九世紀意識型態的興起，其背後有一群擁有強烈想要改變社會的慾望，並且相信可以做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支持著，但對現今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些舊有的意識型態已經失去它的真實性和說服力。少有人願意再相信可以經由某種藍圖（blueprints）的設計和透過社會改造工程（social-engineering）來達到新的和諧的烏托邦社會；同樣的，舊的反對者也失去力量，鮮少傳統自由主義者繼續堅持政府不應干預經濟。今日西方世界的知識份子在政治議題上大致達成了共識：接受福利國家，追求分散的權力，混合經濟體系與政治多元主義。（Bell，1960：372-373）

一九八〇年代末隨著前共產國家的逐一崩解，國際間普遍瀰漫對政治意識型態的反感、排斥，反映在國內也使得三民主義存在教育體系中的正當性更顯不足。雖然有人試圖從公民教育或民主教育的角度爲三民主義辯護，但終究難挽頹勢。

就國內的發展情勢而言，朱堅章認爲，台灣地區對於中山思想的重視漸趨沒落，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由於早年過分教條化，使中山思想蒙冤。高中教科書

若干陳述，甚至不符常識，令學生反感。第二，國家認同問題，由於不認同中國，因而用各種方式忽視或否定中山思想。（朱堅章，1998：6）大致而言，過去檢討三民主義在台灣逐漸消失的原因大都不脫這兩項因素。當然，不可忽略的是，一九八〇年代一波波的民主化運動亦是上述因素形成的背景。

如就上述第一個原因而言，隨著威權體制的消逝，曾經「蒙冤」的三民主義理應獲得平反的機會。三民主義在台灣的傳播，與馬克思主義在共產國家一般，都遭遇到被僵化、教條化、異化的命運。如馮建三之比較，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及教學與台灣三民主義的遭遇，有同有不同。相同是二者都因淪爲官方意識形態，以致清流當中，有許多人選擇敬而遠之。差別有二，一是中國仍不時強調這個官方口號，台灣則懶得再去提及。二是馬克思主義畢竟「家學淵源」，中國官方儘管僵化之，民間及海外對它的議論，仍然不絕如縷，其生命力依舊暢旺。三民主義在台雖（曾）有龐大教學陣容，畢竟受到現實所限，未能接軌於國際的進步論述。（馮建三，中國時報，2003.8.14：A15）

諷刺的是，若說三民主義在建立起仿效馬克思主義那樣的哲學思想體系上沒有獲致太大成功，雙方卻在樹立一種所謂「正統」觀上出現微妙的相似性，這種強調「正統」觀點的詮釋，也因著該政權的崩解而漸漸被埋葬。曾建元認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給了我們關於三民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啓示。依照蔣中正詮釋觀點建立的正統三民主義及其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在台灣民主化的挑戰下，已經面臨了崩解的邊緣，三民主義若要能夠因應二十一世紀人類的需要，則它必須及早擺脫政治的包袱，開放異端詮釋的各種可能性，以豐富其內涵，回復其創造力與生命力。」（曾建元，1997：33）

然而，隨著台灣國家認同的轉向，亦即上述朱堅章所稱的第二層原因，使得三民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不免出現更多時不我與的喟嘆。陳其南在＜孫中山思想研究與學術界的政治意理＞一文裡，分析了解嚴後知識份子在面對「像『孫中山思想』這樣充滿政治意味的課題」時的困境。」他認爲由於孫中山所代表的黨派立場和政治位置，使的他的思想無法被本土知識份子或學術研究者客觀地來加以探

討和分析。孫中山思想因爲被有意地放在意識型態和政治黨派的染缸中浸蝕，因此其政治標籤的顏色以較其內容的質地更爲鮮明，甚至後者完全爲前者所掩蓋。另一方面，大多數關心此問題的知識份子和學者，也在威權的意識型態中各自浸染出不同的的標籤來，對於色彩這麼鮮豔的孫中山思想也可能很難回到一個自由的學術觀點來給予理性的凝視與思索。（陳其南，1998：237-239）

解嚴初期對三民主義的諸多批判與挑戰，與其說是針對孫文學說，毋寧說是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尤其自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去中國化」，甚至「去中華民國」的走向更趨明顯、堅定。舉其較受矚目的議題包括：2002 年 5 月 22 日，法務部長陳定南一席「憲法及現行法律對『國父』兩字沒有定義」，國父是誰，要定義清楚，否則「紀念日暨假日放假條例草案」不能輕率過關。此言一出，立即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政壇風波。在今日台灣，這場「國父是誰」的政治口水戰，當然是意識型態掛帥下的產物，是國族認同的光譜上，兩個極端的又一次交鋒。（潘光哲，2003：1）2003 年 8 月 23 日前總統李登輝一句「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再度掀起軒然大波。（聯合報，2003.8.24：A4）同年九月分又有一連串「台灣正名」運動的發起，緊接著新出爐的「高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草案」將中華民國史列入世界史的範疇；2003 年年底更新一波「公投制憲」的話題，這股來勢洶洶挑戰中華民國合法性的主張，甚至使得向來以捍衛中華民國自居的政黨都出現自行棄守「五權憲法」的言論。（聯合報，2003.11.24：A4）

2003 年 11 月 12 日，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大肆慶祝「國父誕辰」，反倒是在野的國、親、新三黨盛大舉辦紀念國父活動，以聲稱「藍軍傳承中山先生救國愛民精神。」（聯合報，2003.11.12：A4）但這也僅止於選舉動員的意義，在野黨在孫中山思想方便畢竟沒有提出任何動人的論述。眼見台灣反對黨（集團）在論述能力上的「失語狀態」，張登及提出以「孫文精神爲復興之本」，以督促反對集團拿出理想與藍圖。他認爲台灣社會面臨的二大根本問題，一是統獨，二是貧富差距與社會公義，在這兩方面，孫中山思想都可以提供在野黨「重新出發」的機會，而不必辛苦地另外摸索其他新的正當性。（張登及，中國時報，2003.11.11：A15）

值的注意的是，即便政治立場上傾向台灣獨立者，亦非鐵板一塊地反三民主義。例如陳儀深曾言：「在中華民國憲法的『三民主義條款』未能改變以前，筆者認爲民間知識份子仍有必要依據國家社會的新需要，去研究、詮釋三民主義，以『帶領』政府走向一個更進步的時代。」（陳儀深，1989b：747）而在這一波修憲、制憲爭議中，亦不斷有人重新提出憲法中繼承孫中山思想的部分。例如，2003 年 8 月，以關懷弱勢族群，訴求社會公平正義而成立的「泛紫」聯盟，其召集人簡錫堦強調憲法「確保人民的生存權與社會權」的重要性。他說到「在目前的憲法中，繼承了孫文學說中傾向社會主義的部份遺產，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公用事業國家專營、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推行衛生保健與公醫制度、推行義務教育等等。但眼前政府的政策卻是背道而馳，有違憲之嫌。」（簡錫堦，中國時報，2003.11.25）顏厥安於＜公投新憲法前言＞一文中提到，「如果不務競選伎倆之虛，真正爲台灣前途計，以『民生主義擅場時代』爲思考背景來全盤翻修憲政體制，也已經刻不容緩。」（顏厥安，中國時報，2003.12.5：A15）許倬雲則提醒「藍軍」，「中國國民黨最有價值的『黨產』，乃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部分，尤爲孫氏超越時代的卓見；社會福利國家尚未出現之時，孫氏已提出了以國家公權力，推行社會福利。」（許倬雲，中國時報，2004.1.5：A2）更近期的例子則是，由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等民間團體發起的「百萬廢票聯盟」，其總統候選人所提的七大政見之一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聯合晚報，2004.1.31：2）

第二節　重新發現的可能性

若將時間拉回至解嚴後三民主義開始面臨嚴厲撻伐之際，尤其是民國八十三年年中，隨著大學聯考廢考三民主義呼聲的出現，報紙媒體也開始較大量出現相

關的報導與讀者投書[1]。觀察當時輿論的反應，除去部分仍舊固守僵化意識型態的論述之外，多有認爲是過去失敗、錯誤的三民主義教育，造成國人對孫中山思想的普遍反感與誤解。也因此，「恢復孫中山思想原貌」成了當時捍衛三民主義者普遍的呼籲。然而，解嚴迄今，三民主義是否真有任何中興？所欲中興者爲何？

筆者擬從一篇文章談起。孫治本在＜在全球化時代看民生主義＞一文裡提到，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帶來許多跨國界的新問題，例如國與國間更不均衡的發展，全球資本主義的強化危及民族國家的民主政治，對各國金融秩序、社會福利與環境保護政策均有所影響。（孫治本，2003：68）換句話說，諸多不利跨國資本自由流通或投資的政策，都面臨廢棄或降低標準的考驗。但同時，孫治本也觀察到在新一波全球化中，發展較好的國家，均有好的國家政策做爲支持，可見政治的重要性。（孫治本，2003：72）據此，他除了提出「應效法孫中山以人民之生存爲一切問題核心之態度」的呼籲外，更具體地說，是要重新思考孫中山「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的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的看法。他認爲孫中山所謂的「從政治上來著手」在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仍是非常重要的。（孫治本，2003：58,62）

該文引述民生主義第四講所言：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的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夠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產業，不為外國侵奪，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夠來保護工業。中國現在受條約的束縛，失了政治的主張，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這是由於外國資本發達，機器進步，經濟方面

[1] 筆者依據聯合知識庫所提供之新聞檢索，搜尋《聯合報》自 1961 至 2003 年，「三民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詞彙歷年出現的新聞則數與標題則數（請見附錄四）。「三民主義」一詞在民國七十年陡增，從其新聞標題顯示，此與國民黨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的提出有關，之後即逐漸下降。民國八十三年隨著國家考試及大學聯考廢考三民主義新聞的出現，又出現上揚趨勢。

已經是佔了優勢，在經濟力量之外，背後還有政治力量來做後援。

民生主義流露出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在孫治本看來，是對今日自由貿易的主流經濟思想的質疑。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爲例，其爲人所批評之點正是經濟自由化所衍生的國際間與一國之內更大的貧富差距。（孫治本，2003：63）類似的，劉阿榮在＜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利用外資外才：孫中山的兩面思考＞一文中，也指出孫中山當年對列強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壓迫，「對內造成貧富不均；對外發展侵略殖民的帝國主義行徑」的批判，與今日全球化／全球主義的思考實有可對照之處。他認爲在今日全球化的氛圍下，重新審視孫中山思想的兩個不同向度：全球資本與國家權益的維護，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劉阿榮，2001：138,151）

另外，孫治本也觀察到近年來政治意識型態出現了重要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最大特色在於：左與右的政治分野又進一步模糊化。這種政治意識型態的淡化，或者說政治越來越超越左派、右派的趨勢，「使我們不得不佩服孫中山多年前的真知灼見。」（孫治本，2003：65）然而他也注意到，新一波全球化似乎對左派的政治主張形成了較大的衝擊，因爲無疆界的競爭，使高社會福利的成本壓力日益突出，高社會福利甚至被認爲有礙競爭。因此，西方的左派爲因應全球化，做出了許多政策調整。他更指出，最近喊響的第三條路，若要說與從前的各種修正主義有什麼區別，那可能便是：晚近（各種）第三條路的出發是接受經濟全球化的事實。然而，接受此一事實後，還要問的是：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浪潮中，社會正義如何維持？「全球化與正義」因此是各種第三條路的主要爭議點。（孫治本，2003：66-67）

三民主義與「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的淵源其來有自，早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三民主義（特別是民生主義）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便是國民黨政府與許多國父思想研究者歌頌之處，過去慣以「計畫性自由經濟」或「混合經濟」名之，所以魏萼曾說，民生主義計畫性的自由經濟就是以那「一隻看的見的手」來引導那「一隻看不見的手」。（魏萼，1981）

另一方面，隨著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蘇聯、東歐等共產政權紛紛瓦解或轉型

後，部分學者也由這種意識型態的淡化，或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左右和解，藉以突出孫中山思想的預見性。茲舉數例如下：

姜新立認爲不論是東歐還是前蘇聯，在取消共產主義的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及社會主義公有制，轉向市場經濟，並允許公有制、私有制並存，此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非常接近。（姜新立，1998：56）

周陽山則認爲，匈牙利社會黨改革的方向，乃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找尋一條「第三道路」，亦即一條中道的路線。這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民生主義，又堅持民主原則的民權主義立場，儘管內容不盡相符，但基本道路卻是若合符節的。（周陽山，1991：151）

葛永光也說，社會主義轉型成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資本主義也朝中間邁進，似乎大家都在朝「中間路線」前進。三民主義原本就是嘗試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走出一條「中間路線」。（葛永光，2002：297）

朱言明認爲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今日所謂的「第三條路」，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當爲二十一世紀人類奮鬥的目標。（朱言明，2001：43-44）

黃城在＜孫中山思想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教訓＞論文中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發生巧妙的「資本主義向左轉」，以及「社會主義向右轉」之現象。海峽兩岸迄今爲止，還是搖擺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兩端，而忘卻孫中山早已提出民生主義的道路，這是何等的遺憾！（黃城，2002：528）而朱泫源在評論黃文時，呼應了這種「重回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呼籲。（朱泫源，2002：532）

換句話說，他們皆是以一種「新中間路線」、「第三條路」或「中間偏左」的角度來定位三民主義（特別是民生主義）。然而，儘管持有類似觀點者多矣，但大多數僅停留在一種初步觀察，實質上並未見太多深入的論述與實質內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皆肯定民生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經濟思想此一最大公約數外，持此種觀點者相互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相異的理解，

這種差異性多少亦是一直以來對於民生主義左、右不同詮釋觀點的延續。

王振寰評論張晉芬所著《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時指出，所謂第三條路的討論—不是社會主義也非市場資本主義，而是中間路線，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所提倡的涉及國計民生的產業應該收歸國有，而其餘的則讓給私人經營的想法。在孫中山的想法裡，國營企業所產生的市場失靈可以由國家接收，因爲它涉及廣大的民眾和社會生活。從這點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正是現今流行的「第三條路」的原始版本之一（雖然這是一個意識型態產物而缺乏社會科學的論證）。在此意義上，我們是不是也該重讀孫中山而非只有 Giddens。（王振寰，2001：327）

李英明認爲，孫中山所設計的國家角色，是要以國家和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做有機的結合。中山先生在此把社會主義的角色引進來，社會主義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是作爲體現國家維繫管制市場的政策、手段而存在的。所以，中山先生認爲，其實社會主義與市場是可以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的。（李英明，1998：79）

事實上，過去許多研究台灣經濟成長的學者，都不約而同認爲一個能幹的政府（strong state）是台灣經濟成長的一大因素。以Amsden和Evans爲例，Amsden認爲，台灣經濟發展成功，部分應歸功於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特殊性，但政府的指導，才是決定性的因素。他認爲台灣不僅僅是一個可以用來顯示政府的干預對經濟發展有實質貢獻的例證；它也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可以用來說明政府組織結構和經濟成長過程之間的互動關係。（龐建國譯，1986）Evans則認爲一個市場取向的國家機關（state apparatus）是開發中國家能否在國際分工環境中成長的關鍵，而台灣是國家機關和市場機能同時成長的一個典型例子。他認爲來台之後的國民政府，因爲與台灣當地的資本家或地主較無利益上的牽連，而增強了國家機關絕緣於資本家的特性，使其擁有特別高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這種國家機關和私人資本在結構上和意識型態上的分離[2]，促成了一種更爲有效的市場

[2] Evans認爲國民黨的意識型態－三民主義，是一種介於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和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之間的思想，至於偏向哪一邊，則看詮釋者的偏好而定。他認爲

取向。台灣經驗促使我們這麼思考：「自由市場需要強大的國家機關」。（龐建國譯，1989）Barret and Whyte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爲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科層體制，使得政府能夠和有利的經濟利益保持隔離且支配它，這似乎已成爲台灣所呈現的發展形式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丁庭宇、馬康莊譯，1986：84）

確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孫中山久已有之的思想和主張。孫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義，要同時解決“救貧”和“防不均”問題，其實也就是要協調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問題。孫中山認定救貧與防不均必須同時進行[3]，並找出一種制度來給予解決，這種制度，他把它稱之爲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有時又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而其原則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表述出來：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戴金珊，1998：70-71）平均地權和節制私人資本都是爲了防止產生大的兼併，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然而進行工業革命又需要大量資本的投入和集中作用。在這種矛盾中，國家作爲代表全社會利益的總資本家出現了：由它來籌畫建設規劃，由它來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由它來分配和使用利潤。（戴金珊，1998：100-101）

當然，對於政府過去表現出的對經濟的強大干預作用，是服膺於孫中山遺教，抑或祇是便宜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則有不同的看法。不論是否出於一種誤打誤撞，相較於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黨國不分的年代，今日再論「政府」角色，其最大差別就在「民權主義」的落實。這種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連環性」，特別用在看待國營事業的角色上，更能顯現出意涵。早年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日本殖民政府遺留的大多數產業將之收歸國有，表面上雖有「發達國家資本」作爲其正當性的掩護，但由於民權不彰，民主憲政尚未確立，不免引發「國有」變成「黨有」、「大私有」的疑慮。（陳儀深，1989a：714）這種「黨國資本主義」所產生

三民主義不很鼓勵財富積累，而當時的國民黨相對而言比較注重清廉的政治文化。（龐建國譯，1989:44-45）

[3] 「同時」，或「先求富再求均」代表了左、右兩種不同意識型態的拉扯，過去國內學者及許多學位論文多以「均富」二字實際上逃避了這個問題。發展經濟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兩難，晚近學者有從孫中山與John Rawls的主張加以比較。如詹火生（1991）、程立顯（2003）、楊桂杰（2003）等。在三民主義研究所學位論文中，亦有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賀華鋒（1993）所撰＜孫中山互助道德與羅爾斯正義思想之比較研究＞。

的弊病，更是後來強力主張「民營化」者所持的理由之一。孫中山在民國元年曾言「雖然國有之策，滿清政府以之亡國，吾人所反對者也。然則向之反對鐵道國有者，豈與本政綱抵觸者乎？是不然。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爲尤甚。故本會政綱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此也。」（孫中山，1989b：33）於今讀之，仍有其歷久彌新的意義。

其實不待解嚴後在野人士對國營事業展開「解構」，侯立朝早已對台灣過去扭曲、錯亂的所謂「國營」企業提出嚴厲批判。他指出，此地所習稱的「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實際上論歸屬應該叫做「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4]。公營企業，不是「國有」（國家所有），應該是「民有」（全民所有或人民所有）。私營企業，是個人所有的企業，所以不應叫做「民營企業」，只應稱爲「私營企業」。公營企業都應歸屬於民有，而非「國有」或「官有」或「黨有」。所謂「民有」是依照孫中山先生的定義來解釋的，「民有」之意義就是爲全民所有，也就是「民治、民享」的民有，而不是「官治、官享」，更不是「黨治、黨享」的國有。現在中國[5]的「公營企業」都搞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政府代管而把它「官僚化」和「黨權化」，將屬於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共有的企業，轉變爲「官僚佔有」或「黨組佔有」，進一步「化公爲私」而爲特權統治階級所佔有，使「公營企業」的歸屬性完全落空，人民共有的資本完全被他們竊盜了，人民共有的企業完全被他們敗壞了。（侯立朝，1985：285-286）

對於私有化的呼聲，侯立朝也批評此舉是「趁火打劫」。他說到，台灣中國的「公營企業」被竊盜被敗壞，是一直受到社會的批判和詛咒的，因此也就引起「泛私營主義者」的趁火打劫，而要把它「開放民營」，以「私營」爲萬靈丹，認爲只要把公營的企業都變爲私營的企業，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這是很天真的「走資派」。如果要把「公營企業」辦好，第一要公開爲「民有」，第二要公開

[4] 瞿宛文也主張以「私有化」取代台灣較常使用的「民營化」一詞，以凸顯國營企業「私有產權化」、「財團化」的性質。（瞿宛文，2003：245）
[5] 侯立朝在此所指「中國」包含了台灣與大陸。

爲「民治」，第三要本於經濟學的原則辦事，因而才能達到爲人民所共享的目標。這也就是要把「公營企業」人民化、民主化、科學化、共享化。（侯立朝，1985：287-289）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爲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一四二條也明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爲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然而，自從解嚴後，公營事業民營化搭著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訴求，似乎也成爲高度正確的政策走向。加以三民主義地位江河日下，自身難保，似乎也不見國父思想學者再理直氣壯地指責此政策違背國父遺教與立國精神。憲法基本國策形同具文，三民主義反倒必須從國家機器走下／走上街頭以企圖重新換回立國精神。例如民國七十八年，國營事業員工走上街頭，宣布要「把民生主義找回來」，他們指責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違背民生主義「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基本原則。（民生報，1989.11.13：13）2003 年，中華電信員工也藉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喚醒政黨重新思考「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意義。（中國時報，2003.9.23：A6）

對於這種現象，瞿宛文在觀察了公營事業「私有化」政策推動十多年後，有進一步的反省。她指出，國民黨政府欠缺政治正當性，以致「民間」認爲公營事業的「公」，公共性不足，只代表黨國而不代表全民。到了後威權時代，問題就可以比較清楚，政治正當性不會自動帶來「公共性」，「公共性」不會隨著威權之解體而自動產生，「公共性」須要有公共的政治與制度來支持。（瞿宛文，2003：6）在威權時代，威權國家以其方式維持相對於資本的「自主性」，除了奠基於軍事力之外，也奠基於公營事業等國家手中握有的龐大經濟資源，公營事業也起了牽制私營財團的力量。同時，爲了建立政治正當性，以公營事業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務網，也是清楚的政治目標之一。而在此國家領導工業化的時代，經濟技術官僚掌權，三民主義爲此威權體系提供理論支持，而經濟自由主義相對弱勢。在解嚴過程中，經濟自由主義配合著政治自由主義，來幫助打倒威權，加上全球意識型態霸權位置，因此新經濟自由主義改居主導地位，三民主義則成了與舊威權聯

合的不政治正確的可笑過時理論。（瞿宛文，2003：18）然而到了後威權時代，問題應是要重新建立「官」的「公共性」，確認「商」不等於「民」。（瞿宛文，2003：3）威權體制解體爲必然，但公營事業應該是從屬於公眾的，目標應該是重新建立其「公共性」，將其與威權體制分割，而不是認定其必然是威權體制的一部份，應一起被解體瓜分。（瞿宛文，2003：13）從公共化、社會民主、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可以是「洗刷三民主義的污名」（瞿宛文，2003：18）的契機。

在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方面，孫中山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張固然可以提供有心者重新挖掘，以填補台灣在這方面的匱乏；在統獨、族群議題方面，孫中山對台灣「民族英雄」蔣渭水的影響，不也開創出另一條繞過國民黨政權，重新發現孫中山思想的途徑嗎？